

国际资本流动的区位导向与产业导向

陈明森*

【内容摘要】跨国资本的国际流动是区位导向与产业导向二维空间。二者之间既存在着差别，又是有有机联系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利用外资量的增加和积累，为该国家或地区产业变迁、演进的能量积蓄；而产业结构演变又会影影响该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而影响外国资本投资流量。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区位导向 产业导向

【中图分类号】F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052 (2003) 05-0002-05

跨国资本的国际流动是二维空间运动：一是资本和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流动，称为资本区位配置或区位导向；二是资本和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流动，称为资本产业配置或产业导向。二者之间既存在着差别，又是有有机联系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利用外资量的增加和积累，为该国家或地区产业变迁、演进的能量积蓄；而产业结构演变又会影影响该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而影响外国资本投资流量。

一、区位优势与国际资本流动区位导向

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企业优势与区位优势。企业优势决定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因为跨国公司在异国他乡投资，与东道国企业相比，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它们只有在规模经济、研发能力、分销渠道、原材料控制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垄断优势，才能在与当地企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区位优势则决定国际资本的空间配置。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的空间配置具有非均衡性，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国的分布差异很大，有些国家或地区所吸收的国际资本的数额较多，有些国家或地区所吸收的数额则较少，主要是由区位条件决定的。

在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中，发达国家吸收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际直接投资，比例高达70%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只吸收了剩余的30%左右，其中非洲、西亚、中亚、太平洋岛国以及中欧和东欧等广大地区只吸收了不到5%的国际直接投资。从时间序列看，在近20多年以来，国际资本这种区域过度集中的现象略有减弱。发达国家吸

收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从1980年至1985年的75%，下降到1996年的不足60%。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拉丁美洲基本持平，都在10%左右徘徊；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则迅速崛起从80年代以前不足10%，跃增到1991年至1995年的19.6%，再增到1996年的23.3%。东欧和中欧近年也有一定发展，从1990年以前的0.1%发展到1996年的3.7%。

资本区域之间流动的驱动力，来源于区域之间的资本边际收益差异，即区位优势的差异。区位优势是影响跨国资本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东道国区位优势较大时，跨国公司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优势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一是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成本因素是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首选战略考虑。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决定生产成本进而是资本效率的重要因素，因而也就决定着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只有当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富，资金、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低于资本输出国时，外国直接投资才易于发生，导致资本由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昂贵、边际收益率较低的区域流向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资本边际收益率较高的区域，从而引发资本为寻求增值而产生的迁移力。

但是按照边际收益率递减的普遍规律，资本流出区域由于资本减少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将会上升；而资本流入区域由于资本增加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最终将会造成这两个区域之间资本流动的减缓，乃至会出现反向流动。另外随着技术进步，制造业中单位产品资源消耗量下降，替代品迅速出现，产品中所需要的非

* 陈明森：福建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01BJY102)《产业升级外向推动与利用外资结构调整》的部分成果

熟练劳动力和原材料因素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因此跨国资本在进行地区选择时,廉价劳动力不可能有永久的优势。

二是投资环境。它是支持资本运营的一切外部条件的总和,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条、市场潜力等投资硬环境,也包括政策法规、制度安排,乃至社会人文习俗等投资软环境。当然在投资环境中的上述几个变量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是等量齐观的,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投资环境中的不同变量往往会起着不同的作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当今的国际投资者更看重投资软环境,一国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安排,特别是投资政策自由化,往往是该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随着全球各区域合作步伐的加快,各国投资政策会更趋于开放,一般认为,进行更为广泛的宏观经济改革,完善财政税收政策,改善企业制度结构,扩大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进入领域,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外汇管制,提高政策透明度,都是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政策条件。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国家之一,其主要原因就是投资软环境中的转轨变量起着极其重要作用。所谓的转轨变量(或称为体制改革变量)是指中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导致的区位变量整个体系的巨大变化。中国从闭关锁国、计划经济向全面开放、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此所引发的独特区位变量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吸引力是前所未有的。

投资环境的作用后果,有的最终可以进入投资成本(如税率高低、基础设施收费水平等),从资本的投资收益中得以反映,但有的只是表示资本进入的难度(创办企业的审批等),不一定能够在资本投资收益率中得以反映,因此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把它作为单独因素进行考察。显然,对资本所在地而言,如果投资环境系数降低,将引发资本外流;反之则阻止资本外流,甚至导致新资本的流入。对资本吸纳地而言,较低的投资环境系数,将不利于对资本的引进;反之则有利于对资本的吸引。

三是资本所在地与资本吸纳地的空间距离。二者之间的空间距离,既会影响产品的运输费用,又会影响到资本的流动费用,从而对跨国资本的国际流动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一方面产品运输费用与两地距离成正比,产品生产地点距离产品销售地点越远,运输费用也越高,产品售价也越高,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效应作用,价格越高,产品的销售量也就越小。这样当产品生产地点与销售地点距离达到某一点时,产品价格可能正好高到无人购买,那么二者之间的距离就是产品的市场半径,在半径之内形成产品的市场区。在市场区以内产品有销量,厂商产品销售可以通过国内贸易或国际贸易加以解

决;而一旦超出市场区,产品没有销量,厂商只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当地生产、当地销售,解决产品的销售问题。^[1]另一方面资本所在地与资本吸纳地的空间距离,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又会影响到资本流动费用,包括交通运输费用、信息通讯费用,以及由于受到空间距离影响,造成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交易规则差异而形成两地市场排斥与摩擦。因此资本流动往往向具有较低交易费用、较有亲和力的周边地区开始的,逐步向半径更大的市场延伸、辐射。因此,厂商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市场区以外,并按照国际资本流动的空间距离由近而远逐步展开,顺序递进。

根据以上论述,资本空间流动的驱动力可用数学公式表示如下。如果用F表示资本空间流动的驱动力,用 c_1 表示供应地资本边际收益率,用 c_2 表示需求地资本边际收益率, e_1 表示供应地投资环境系数, e_2 表示吸纳地投资环境系数,r表示资本流动距离,b表示资本流动中空间摩擦系数(它与两地之间市场亲和状况、运网联结状况等有关,并成正相关关系),那么资本空间流动驱动力可表示为:

$$F = \frac{(e_2 \times c_2 - e_1 \times c_1)}{r^b}$$

资本区域之间流动数量,主要取决于资本流出区域的资本供给量和资本流入区域的资本需求量。资本流动实际数量,受到资本供给量与资本量的短线约束。如果以B表示两地资本的实际空间流量, P_1 表示供给地资本有效供给量, P_2 表示需求地资本有效需求量,则资本实际流量公式为: $B = \min\{P_1, P_2\}$ 而资本需求量与资本供给量往往又是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土幅员、人口数量,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规模成正相关关系,因此,经济大国往往又是资本需求与资本供给最多的国家或地区。

根据对1996-1998年全球58个国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力、科教水平、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状况等5大类共27个投资环境因子的分析结果^[2],可以进一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国家利用FDI多少主要是由这个国家总人口、GDP总量所代表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市场规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代表的城市化水平、盈利机会和偿还外债的能力决定的。通过线性回归,上述因子与FDI呈现如下关系:

$$FDI = -6483.9498 + 36.6260 \times \text{总人口} + 0.0169 \times \text{GDP} + 1.1137 \times \ln(\text{社会经济综合满意度}) + 111.9056 \times \text{城市人口比重} + 173.98 \times \text{偿债率}$$

$$R = 0.8724 \quad F = 33.1174 >> F_{0.1}(5, 58-5-1) = 1.97$$

上述公式只是反映了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一般情况,实际外商资本不同来源与不同结构,以及东道国

发展不同阶段, FDI对投资因子选择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一些西方学者, 如布拉什 (Brash, 1966)、迪恩 (Deane, 1970)、福赛斯 (Forsyth 1972)、安德鲁斯 (Anderws, 1972) 等, 曾针对某些特定国家424家企业 FDI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从企业回答的各种决定因素的重要性程度统计, 在影响企业FDI因素中, 市场因素约占29.27%, 贸易障碍因素约占8.04%, 成本因素约占23.73%, 投资环境因素约占19.87%, 其他因素约占19.15%, 市场因素居于首位, 其次是成本因素。

从我国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情况看, 来自港澳台和东南亚资本, 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比较重视政策优惠条件和劳动要素成本, 这些因素所呈现的变量与直接投资具有高度显著性正相关关系。而对于来自欧美的跨国资本而言, 主要是以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欧美跨国资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最大动力是来自于中国巨大市场需求的吸引, 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由持续经济高速增长所引发的国内需求扩张潜力, 可以为大型跨国公司提供难得的销售场所, 有利于提高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报酬, 实现利润边界最大化。而劳动成本并不构成欧美等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 因此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尽管工资水平不断上涨, 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准, 而且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 但跨国公司之所以仍然在该地区大量投资, 主要是看中当地的人才供给、宽松的经济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广袤市场腹地。

二、国际资本流动产业导向及其决定因素

上面所论述的是,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但是外资进入东道国以后还面临着产业选择问题。实际上国际资本进入东道国以后在一次产业、二次产业和三次产业之间以及在各次产业内部的不同行业之间的配置是非均衡的, 而且这种非均衡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国际资本对东道国不同产业的投资选择与产业导向, 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一是投资国 (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 产业结构现状与演变趋势。境外投资商拥有 FDI 资本, 往往不是一般的货币资本, 而是与特定生产设备、技术、管理经验等相联系的产业资本, 因此在进行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时, 首先必须考虑自身的产业优势和产业特点, 一般是从自身垄断优势 (包括资金、技术、人力资源、营销网络等) 出发的, 进行投资产业选择。不论是水平型跨国投资、垂直型跨国投资, 还是“知识-资本”型跨国投资, 跨国公司都是从最擅长核心业务出发, 将其在特定产业的垄断优势在地域上进行延伸与扩散。投资国产业结构往

往决定了这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受资国产业结构变化, 当然后者变化会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迅速变化, 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总体趋势是,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逐步由农业、矿业等初级产业部门为主转向以制造业进而以服务业为主。特别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在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 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已退居三大产业之末, 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1970 年到 1990 年, 初级产业在这些国家中所占的比重由 22.7% 下降到 10.4%。在 20 世纪整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 第二产业在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稳居第一位但略有下降, 1970 年占 45.2%, 1980 年占 43.8%; 而同期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居于第二位且总体呈上升趋势, 1970 年占 32.1%, 1980 年占 37.7%。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第三产业比重跃居第一位且优势逐步扩大, 1985 年占 42.8%, 1990 年占 53.4%; 同期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退居第二位, 1985 年和 1990 年所占比重分别为 41.7% 和 36.2%。

战后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在各大产业内部投向的调整也是十分深刻的, 其基本趋势是从低生产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生产率、高附加值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如在制造业领域, 1980 年世界 9 大对外投资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和美国) 对制造业投资分布的情况是: 自然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居第一位, 占 46.9%;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居第二位, 占 45.9%, 其它制造业共占 7.1%。到 1985 年中期,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所占比值则上升为第一位, 占 48.1%; 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占比值则降至第二位, 占 43.2%; 其它制造业占 8.7%。到 1990 年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自然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其它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51.2%、38.5% 和 10.0%。^[1]

可见战后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经过了由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产业为主, 再向第三产业为主转移的发展过程。从一般意义上讲, 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上述演变过程, 是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对外投资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过程相吻合的, 即顺应了产业结构从初级产业向制造业转变, 再向服务业转变的大趋势, 只不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化与投资国本身产业结构变化在时间上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这种滞后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跨国公司新兴产业或新产品, 先在本国市场上生产、销售, 国内消费市场支撑新兴产业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国内市场趋于饱

和,生产产品受到市场约束,迫使跨国公司通过对外贸易以至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寻求海外市场;二是出于跨国公司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垄断和保密考虑,对于新兴产业一般是不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海外转移的,首先向海外投资转移往往是二流产品和二流技术。

二是东道国资源禀赋与投资环境的差异。既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本、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也包括市场规模、市场结构以及现存产业结构等。由于自然条件、地理区位、经济发展程度乃至历史人文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是不同的,不可能对所有行业和项目投资具有相同的吸引力。基础工业、制造业、服务业投资所需的环境是不尽相同的,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与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所需环境的差异性就更大了。一般来说,在劳动力供给较为丰富而技术、资金较为匮乏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是境外资本进入的首选行业;反之则反是。另外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潜力与产业结构存量对国际资本的产业流动也有很大的导向作用。市场容量大的国家或地区,容易吸引具有资金密集、规模经济国际资本的进入。

另外外资进入的产业选择还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中越是发达的、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越是能吸引境外该产业资本进入;反之越是落后产业,越是难以吸引该产业资本进入。因为产业发达程度往往是与产业集聚相伴随,而产业集聚则可以节省境外资本进入的投资成本和交易成本,包括区域内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分工,而造成的投资费用和投资时间的节省;地理上邻近企业之间交易,而导致的运输费用和信息搜索成本的节省,以及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的利用效率等。因此产业链也是重要投资环境。

实际经验证明,在一个国家全部产业体系中,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越是能吸引国际资本特别是处于技术创新阶段的国际资本的进入。美国在上一世纪的80年代开始从资本净输出国变成资本净输入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政府借助于星球大战计划,加大对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与研发,使美国包括生物技术、计算机、工业机械和航空工业在内的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全球竞争优势,吸引了来自欧洲、日本等国际资本的大量投资。从1975年到1990年间,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项目总数为2840项,其中进入量最大的前三个制造业部门是电子和相关产品(包括计算机工业)、工业机械、化学工业(包括生物技术工业)。这种投资的目的,既是出于看好这些产业的成长性和市场潜力,也是出于学习的需要。

总之,东道国资源禀赋与投资环境的差异,造成东

道国不同产业的比较利益差异,从而对外资进入的产业导向具有强烈驱动效应,以及外资在东道国不同产业分布的非均衡性。

三是东道国产业结构政策效应。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制定的有特定产业指向的政策总和,其目的是通过对各个产业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而改变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以促进某些特定产业超常规发展,同时也限制某些特定产业发展。而外商到东道国投资,其目的是要获取高额利润,占领东道国市场。基于上述目的外商所确定的投资领域不可能完全符合东道国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也必须产业诱导,通过税收、信贷、财政补贴以及审批制度等经济杠杆和行政杠杆,使得外商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符合东道国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战略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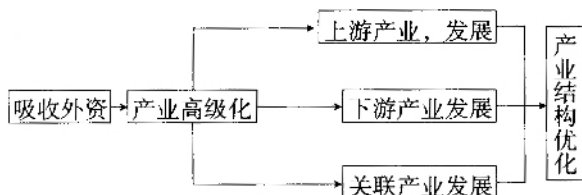
当然政府利用外资产业政策并不是总是有效的,也存在着产业政策失败的可能性。其主要原因是:制定产业政策缺乏科学性,政策目标违背产业演进和发展规律;政策措施与政策目标不配套,造成利用外资产业政策目标取向与外商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以及政策环境发生不可遇见的巨变等,都可能造成利用外资产业政策的失效。要防止政策失效,就要对症下药,避免上述各个环节问题的发生。

三、国际资本流动区位导向与产业导向的相互关系

国际资本流动的区位导向与产业导向是有机联系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利用外资量的增加和积累,为该国家或地区产业变迁、演进的能量积蓄;而产业结构演变又会影响到该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而影响外国资本投资流量。

一方面国际资本的区间流动,决定该区域所能获得的外资流入的总量,借助于引进外资,不仅可以促进现有产业的外延扩张,并通过国外的高级产业移植到国内,促进东道国国内新兴产业发展,而且还可以通过引进产业的波及效应,导致国内各产业互动演进。这是因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各个产业之间存在着广泛、复杂而密切的经济技术联系,各个产业既需要其它产业为自己提供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同时又把自身产出提供给其他产业以满足其需求。产业之间这种联系称为产业关联。产业关联导致整个产业之间存在着产业波及效应,即当某一产业的投入产出发生变化,将会直接或间接引致其他各个产业投入产出量发生变化的效果。正因为产业之间存在着关联效应,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FDI而高级化的产业可以通过产业波及媒介而发生扩散效应。具体表现为:回顾效应,即指该行业结构变化或效率提高对自己提供生产资料的上游部门发生的影响;前瞻效应,

即指该产业创新或效率提高对使用其产品下游部门所发生的影响；旁侧效应，即指该产业成长对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总之无论是前向关联、后向关联还是旁侧关联的产业和部门，都能通过其扩张而产生诱导性投资，而诱导性投资不仅能促进具有关联效应的产业或部门发展，而且反过来又能推动自身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从而使得整个产业部门得到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整个传导过程如下：



产业互动演进示意图

另一方面国际资本的产业之间流动，会影响资本输入国的产业演变的进程与方向，进而改变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从而对国际资本区位流动产生影响。因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产业梯度问题。这是由两类不同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的现有高度所决定的，也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实现或寻求企业所有权特定优势的一个重要条件。产业梯度落差以及隐含在其中的产业结构状况，既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现实基础，也是制约其引资方式和技术含量的基本条件。

跨国投资具有明显产业集群趋向。所谓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产业领域中，大量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集群，并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呈现专业化地理分工的特征，处于集群之中的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形成了介于市场与等级组织之间的网络结构，通过柔性生产，满足需求多变、技术多变的需要，构成国家或地区重要投资环境。投资于产业集群的国家或地区，不仅可以快速、便捷地获取各种原材料、零部件、人力资本等生产因素供给，节省投资成本和交易费用，而且可以享有研究开发、人力资源、信息等溢出效应，为企业创新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和信息来源，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和学习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在特定产业的前期资本存量与后继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可以解释为推动效应和示范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因此前期投资的业绩会直接影响当前或以后的投资决策。如果外资企业在某一产业投资获得令人满意的利润，那么该外资企业就有可能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或者向上游产业或下游产业延伸，以获取更多利益；反之就会减少甚至转移在该产业的投资。这是跨国投资的“正向推动效应”和“逆向抑制效应”。此外跨国资本的对某一产业投资还会产生示范效

应。如果跨国资本在某一产业的投资业绩表现优异，其他与该公司生产同类产业或性质相近的跨国公司受到利益驱动也会在该产业进行投资，从而在特定产业内产生连带投资效果。而且较多的跨国资本在一国投资之后，它们之间彼此成为供给者的可能性增大，相互需求又进一步促进有关专业化的投入，形成一种相互推动型的投资。从经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产业的FDI流量与FDI存量和盈利能力有一定联系，凡是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前期的投资存量就会通过推动效应和示范效应引起该产业外商投资流量的逐步上升，并会引起上游或下游相关行业的再投资。□ (责任编辑 娟子)

注释：

[1] 市场区理论是二战前德国著名工业经济学家廖什 (August Losch) 首先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生产地点与销售地点的距离，决定产品的市场半径和市场区，而且不同产品的市场半径和市场区是不相同的，因为它反映了市场需求对运输费用和空间距离的承受与克服能力，这种承受与克服能力越强，产品市场半径和市场区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因而产品市场区的有限性，既是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又是企业跨国经营策略制定的重要依据，如跨国公司占领国际市场，是通过产品出口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在对外投资中海外子公司如何布局等，都要考虑到不同产品的市场半径和市场区的大小。

[2] 张长春：《影响FDI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11期。

[3] 参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项目：《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联合国出版，销售号：E.93II.A.14

参考文献：

[1] 王志乐主编：《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

[2] 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裴长洪：《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4] 汪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5] 吴建伟：《国际间产为竞争与市场容量》，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6] 崔新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展望出版社，2001年。